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山东大学学报 2014年第2期 刘炳君:《当代中国治腐兴廉的法治体系论纲》 指出国家兴旺和社会发展始终离不开德能兼备的人才和惠民泽世的权力。然而人性固有局限,权力趋向腐败,几成定律,故而人和权力的关系构成了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范畴。基于此机理与逻辑基点,法治国家和民主社会始终必定以权力可能导致的人之欲望泛滥为预设前提,而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制衡体系和制约规范。以其将权力有效地控制起来,迫使其尽职尽责而避免其徇私作恶,最大可能地遏制权力寻租的生发机率,最大化维护公权廉洁性。然则,纵观国内外反贪治腐的实践,至少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启示:强化行权官员的职业伦理养成,提高官员自律水平,当然对促进官员廉洁奉公品格的养成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但任何时候绝不能夸大其教化和自律作用,更不能高估其持久价值和实际效能,反腐兴廉的持久绩效必须以专门法律为利器,以民主法治为保障,以有效监督为保证,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2014年第2期 李新亮:《文学作品中视觉与听觉的分化》 指出视觉艺术的膨胀与听觉艺术的萎缩是当代美学中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分化的重要表征。这一艺术分化现象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即过度追求文学作品的视觉化与空间化而忽略听觉化与时间性特征。其实,从文学源头来看,注重听觉化与时间性特征更是文学的本质属性。只不过,经历了语言与音乐的分化及语言与文字的分化之后,文学的发展与听觉艺术渐行渐远,这严重地削弱了文学作品的艺术表达效果。文学的未来应该回归其固有的听觉性特征,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声音与时间的艺术。许多注重听觉意象表达的现代经典小说指明了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4年第2期 陈伯海:《“感事写意”说杜诗——论唐诗意象艺术转型之肇端》 指出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于唐开元、天宝年间进入其成熟阶段后不久,即因时代变乱的驱动,由“感物兴情”转向“感事写意”,大诗人杜甫成为这一新诗潮的领路人。杜诗不仅在“感事”与“写意”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和丰富的经验,为后人开启了众多法门,还通过其创作实践,从整体上拓宽了传统诗歌的表现范围与功能,相应地促成诗人思维方式和艺术方法的更新,使诗歌艺术的演变有了新的方向和路径。杜诗的“感事写意”虽未脱离唐人“主情”的大背景,而其于感事述怀之际,常要引入“反思”的因子,则又为宋人的“主意”诗学创设了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感事写意”诗潮恰构成由“唐音”向“宋调”过渡的起始,亦便是古典诗歌意象艺术转型之肇端。

厦门大学学报 2014年第2期 鲁西奇:《人为本位: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路径》 指出王朝兴衰、社会形态演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模式与阐述框架,从不同角度与层面揭示中国历史的本质与奥秘,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但都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主体——人。“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国人”的历史,是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不断“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摸索并建立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造并不断“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人为本位”的中国历史学,应当是叙述、分析、阐释这一历史过程的学问。认识、叙述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理解、认识历史,都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以“中国人”作为历史叙述与认识以及认识历史的主体。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2014年第2期 袁济喜:《从〈世说新语〉看古代文艺批评形态的演变》 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世说新语》所开创的文艺批评方法,彰显出来的重要性,对于先秦两汉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形态的重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影响到唐宋时代的诗话批评形态的形成。《世说新语》在理论批评形态上的转变,首先在于文艺观念的转化上;其次,《世说新语》对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形态的转变的作用,还体现在它采用诗话的方式与形态来从事文艺批评。从《世说新语》延及《六一诗话》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形态,虽然没有《文心雕龙》《诗品》那样正宗与专门,但是它在不经意间发出的批评声音,创变出来的批评形式,迸发出来的批评火花,往往较之主流文艺批评著论更有价值。

浙江大学学报 2013年第5期 胡可先:《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指出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

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2 期 张祥龙:《“美在其中”的时间性——〈尧典〉和〈周易〉中的哲理之“观”及与他者哲学的比较》 指出无论是在《周易》还是《尚书·尧典》里,“观”或“观天”都有一个非对象化的维度,即观时—间之中。这“时中”处于一切二元化分裂和一元统一之前,是正在发生之中、接通之中、阴阳互补对交之中,简言之,是让“美在其中”之中。而这“时中”与舜孝是内在关联的。舜孝的难处、真实性,尧对它的测试,乃至孝与政治能力的相关性,都要“在其中”才能得到领会。由此我们也才能知道孔子为何要讲“《尧典》可以观美”。现象学特别是勒维纳斯的他者哲学与这种思想之间似乎有某种可比性。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 年第 5 期 张海鸥:《宋代赠送序文体研究》 指出赠送序是因送别而作的序,是一种兴起于唐而盛行于宋的文学性和抒情性较强的应用文体。宋代赠送序的文体形态承唐而来,并略有变化。其制题经历了一个从繁到简的过程,一般题作“序”“叙”“引”或“送某一首”,也有少数不标“序”“叙”“引”者;其语体承唐代李华、韩愈、柳宗元而来,主要以散体写作;其篇幅通常在四五百字左右,也有言简意赅的语录体和千余字的长篇大论;内容上往往是议论说理的说教之文,间有写人叙事比较细腻的文章。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2 期 李长城:《英国对公诉程序滥用的制裁及其启示》 指出公诉程序滥用可能导致对被告权利的严重侵犯,使得一场公正的审判不可能发生。英国构成公诉程序滥用的情形包括:未能进行公正讯问、警方与证人不恰当地联系、选择性指控、后期增加指控以及重复追诉等。我国也存在公诉程序滥用的多种情形,应当通过加强辩护律师的作用、强化提起公诉的审查、设置专门的裁决程序等措施来防范公诉程序的滥用。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1 期 刘献君:《在“长善救失”中发展民办高等教育》 指出在我国高校体系中,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都各有优势和劣势。公办高校的优势在于办学历史长、占据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拥有政策优势,而这些恰恰是民办高校的劣势。民办高校的优势在于历史负担较轻、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具有强大的内在发展动力,而这些恰恰是公办高校的劣势。因此,发展民办高校应“长善救失”,用优势去克服劣势。当前,根据民办高校的优势、劣势以及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状况,今后发展民办高等教育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优化学科结构,在特色学科专业建设上有战略性突破;优化师资结构,在人才团队建设上有标志性突破;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在办学特色上有创造性突破;优化组织结构,在管理制度灵活性上有实质性突破;优化资源结构,在资源转化上有发展性突破。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3 年第 12 期 朱刚:《宋话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考论》 指出明隆庆刻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实为话本小说,与有关道济禅师以及南宋禅林的可信史料相比对,我们可以修正该刻本的一些文本讹讹,进而推断话本关于济公家世和生平基本履历的叙述符合史实。话本涉及的临安高僧群,多数实有其人,有关他们的叙述虽经过一定程度的改编,但这种改编准确地反映出南宋禅林的人事背景,并非后人所能措手。话本还涉及众多“太尉”,其实际身份应是南宋的贵戚、武官,且太尉如此之多,乃当时特有之现象,话本的有关情节自然也是宋人所编。故从内容而言,这基本上是一个宋话本。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2 期 王文东:《论世界性宗教在孝道观上的相通——以中国文化中的各大宗教孝论为例》 指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人本主义的儒教、自然主义的道教和佛教(不包括虔信阿弥陀佛的净土宗)以及神本主义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宗教都超越了单个民族界限和固有国界而成为世界不同文化、宗教共处与对话的一个缩影。虽然它们历来在孝道观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争论甚至彼此非难,但如果我们从哲学伦理学层面考察其中的孝论并对它们的思想内涵进行对比和思考,则发现,至少在孝为德性与德行、孝是客观的伦理义务与责任、孝道通天或通神诸方面,这些宗教的确是可以相通的。在本源意义上,“孝”是家庭成员的德性与德行,要求善待、敬爱父母长辈,同时怀念、亲近先祖;在扩展意义上,“孝”是个体超越家庭成员身份,同时作为社会成员身份所应行或必行的伦理义务与责任,要求善待和自己父母长辈一样的老人、感恩和回报社会、忠于生养并教育自己的家园和母邦;在衍生意义上,“孝”是超越于家庭成员一己之私和社会成员之自我立场而博爱群生、德泽万类、至公无私,要求尊重、善待、珍视生命价值,追求超越于家庭和父母之邦的人生信念和永恒生命。